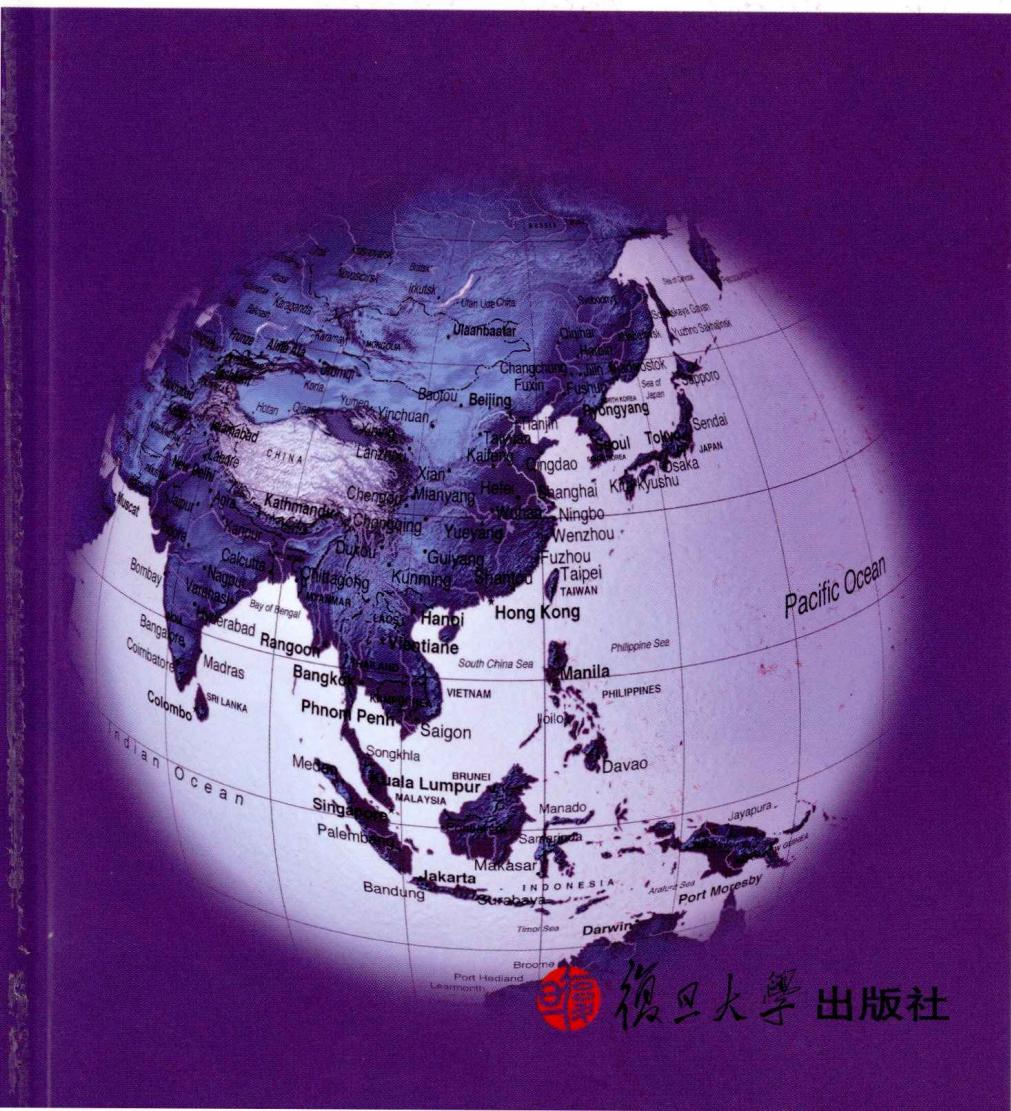


# 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历史与经验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目录

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历史与经验

## 亚洲论坛

### 亚洲论坛

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政府	吴志攀 / 3
评论：季立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 6
论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民间资本的地位和作用	朱荫贵 / 10
评论：韦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副教授）	/ 29
试论战后中日韩三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验	王晓秋 / 32
评论：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36
近代化进程中的长江三角洲城乡人口流动	戴鞍钢 / 39
评论：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	/ 48
脆弱性与小国发展：以新加坡为例	韦民 / 51
评论：林太（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68
多元发展：日本饮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给予东亚文化	
走向现代更生的一个启示	徐静波 / 71
评论：李玉（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83
专题研究	
东方视野中的苏格拉底申辩（上篇）	
——析《申辩篇》中译本的共性旨归	杨俊蕾 / 89

## 高桥和巳初论

——文学、学术与现实、历史的叠影 ..... 戴 燕 / 97

##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的上海认识

——转机的 1931 年 ..... 徐 青 / 111

## 从“绅士游览团”到“领选使”：对 19 世纪末东亚

现代化场景的观察 ..... 王鑫磊 / 121

## 中国青年人时尚观受日韩流行时尚之渗透研究

周 进 / 139

# 史苑萌芽

## 历史书写与叙述政治

——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1903—1952) ..... 张 希 / 159

## 盘点台湾中古史研究六十年

——评卢建荣《陈寅恪学术遗产再评价》 ..... 金菊园 / 176

## 文人之殇

——以“临终的眼”看待日本文化之精魂 ..... 魏灵学 / 180

##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50 年代历史教科书中的

“辛亥革命”叙述 ..... 宋正清 / 195

# 附 录

2010 年世界能源大事记	221
2011 年世界能源大事记	228
2010 年国际金融大事记	235
2011 年国际金融大事记	249
2010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结项课题	266
2010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272
2011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结项课题	273
2011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278

# 从“绅士游览团”到“领选使”： 对 19 世纪末东亚现代化场景的观察<sup>\*</sup>

王鑫磊\*\*

## 引言

所谓现代化，最初是来自西方学界的一种学术归纳，它大致指全世界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现象。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东亚世界也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吹响了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号角。不过，两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模式不尽相同，“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孰优孰劣，最后似乎由19世纪末中日间的一次海上军事交锋给出了答案，并证明了日本模式的正确性。然而，这样一种论断总显得过于简单化，它容易在某种程度上遮蔽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客观认识。跳出胜负论的窠臼，放下对政治体制决定论的执念，重新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客观地呈现现代化的实际成果，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的现代化。

当中国和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之时，同为东亚世界一员的韩国，并没有马上加入这一队列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朝鲜王朝暂未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以及其内部保守思想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sup>①</sup>。一般认为，1876年朝鲜王朝

\*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和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资助，在此深表感谢。同时，作者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访问学者计划”资助，于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前往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访问期间，查找到大量与本文写作直接相关的文献，在此亦向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及奎章阁表示感谢。

\*\* 王鑫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1866年，朝鲜焚毁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法国舰队的江华岛占领，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朝鲜击退侵入江华岛的美国舰队，史称“辛未洋扰”。这两次所谓“锁国攘夷”政策下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朝鲜排外的决心，当时执政的大院君更是以“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刻于石碑之上，忠告朝鲜“万年子孙”，是为“反洋夷石碑”。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并未出现对现代化改革的迫切需求。

在“云扬号事件”<sup>①</sup>冲突中失利后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被迫向日本开港,促使其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开始积极考虑武备自强和开化的问题。而在谈到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时,有韩国学者认为 1881 年(朝鲜高宗十八年)是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年份,而分别发生在这一年 5 月和 11 月的“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派遣活动,则被认为是该转折时期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sup>②</sup>。

所谓“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是朝鲜高宗政府为了观察和学习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改革经验而先后派出的两支使节团队,关于这两支队伍的派遣经过及其对于韩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韩国学者分别有过非常详尽的研究<sup>③</sup>。笔者原本对“领选使”的研究颇感兴趣,而当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绅士游览团”的内容并阅读大量相关原始资料之后,深深感到如果可以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考察,或许能够把研究带入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中去,即讨论有关 19 世纪末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改革的问题。

如果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起点,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步伐都差不多已经迈过了大约二十个年头,尽管两者在性质和过程上存在不少差异,但或多或少都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层面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以往关于明治维新成功和洋务运动失败的论断,使我们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孰优孰劣的问题意识去关注和分析两者差异的面向,比如思想基础、制度设计等,研究的导向也变成了一种经验总结和检讨。总的来说,这样的研究存在一种后见之明的危险,更容易使我们忽略很多历史的具体细节。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具有某些共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思考取向或许能够促使我们尽可能去注意更多具象性、细节性的因素,比如社会现实、技术产品等,并且在细节的对比中去尝试发现答案。事实上,要开展这样的研究,材料并不缺乏,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自身的史料中都有相当多的留存。而本文在这里将要展开的工作,是想以另外一种视角切入考察,即通过 19 世纪 80 年代朝鲜高宗政府向日本派遣的“绅士游览团”和

① 1875 年 8 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近海进行侦察挑衅,与草芝镇炮台守军交火,遭遇抵抗的日军转而攻击防守薄弱的丁山岛和永宗镇,杀害大批平民。其后,日本反诬朝鲜炮击日本军舰而向朝鲜“问罪”。朝鲜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同意与日本谈判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从此向日本打开了国门。“云扬号事件”亦称“江华岛事件”。

② 参见权锡奉:《对领选使行的一个考察:以军械学造事为中心》,《历史学报》(韩国)第十七、十八辑,1962 年版,第 277 页。

③ 韩国学者关于“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代表性研究,可参看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 年,第 105—142 页;权锡奉:《对领选使行的一个考察:以军械学造事为中心》,《历史学报》(韩国)第十七、十八合辑,1962 年,第 277—312 页。

向中国派遣的“领选使”的观察记录,来呈现当时代的人所看到中日两国现代化变革开始若干年后在几乎同一时间点上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情况。

通过这样一种视角进入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朝鲜使节站在第三者立场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比中日两国自身的记录更加客观,也更加细致,通过这样的记录来比较两国现代化的情况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其二,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将中日韩三个国家同时纳入东亚现代化这个问题的范畴中来讨论,从而弥补早期东亚现代化研究中“韩国缺位”的问题。事实上,“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选派的事件,对其后韩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作者也倾向于认为,韩国在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绝不仅仅限于观察者或者跟从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基于这一点,本文也希望借此研究,对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整体性的东亚史研究的框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 一、“绅士游览团”及“领选使”概说

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被迫开港的事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朝鲜王朝政府的神经,但是由于国内保守势力反对开化的呼声依然高涨,所以相关措施的推行依然相当缓慢,直到1881年才算成功地实施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事是在这一年的年初,仿照清朝总理事务衙门的建制,在政府中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从而有了一个推行开化具体实施部门。另外两件事就是“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派遣。应该说,能够顶住国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而在一年之中完成这三件事实属不易,这大概也就是学者之所以认为1881年对韩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

对当时的朝鲜王朝来说,要实行开化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它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而从中国和日本方面反馈的情况都是欢迎其派员前往学习。这种情况下朝鲜方面的决定是向两边分别派出使节,但其背后的考虑则又略有不同。对于考察日本的态度,朝鲜政府主要是抱持一种刺探对方底细的目的,因为它对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戒备的心理,而且也不相信对方会将核心的技术倾囊相授。而对中国方面,朝鲜政府从交涉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直接指向了最急切的需求,即学习军械制造技术以及直接购买机器和军械装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政府先后于1881年5月向日本派出了“绅士游览团”,又于1881年11月向中国派出了“领选使”。

### 1. 绅士游览团

“绅士游览团”,亦称“朝士观察团”,早在1876年日本和朝鲜《丙子修好条约》

(即《江华条约》)议约之时,日本方面就首先提出过邀请朝鲜的朝臣和士绅前往日本游览考察的提议,而当时参与议约的修信使金绮秀就曾经在向高宗复命时提到“详探彼中之物情,是紧切事也,须善为探知可也”<sup>①</sup>。但是,当时朝鲜政府没有立即采纳日方的意见。之后,当朝鲜政府自己有了派员赴日观察的意愿后,主动多次向日本公使暗示之前日方提到的朝士游览的可行性,最后双方就此事达成了一致。

“绅士游览团”由 12 名朝士构成,姓名皆可考,分别是: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锐永、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李元会、金镛元。这些人员的官职从正五品到正三品不等,皆为两班出身。因每位朝士携带 4 名左右的随从人员,整个团队共计 62 人<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绅士游览团”只是目前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习惯性的称法,事实上这一提法在文献中并无记载,当时朝鲜政府给派出的这批人员的官方名义是“东莱府暗行御史”<sup>③</sup>,《朝鲜王朝实录》对于这段历史仅有这么一段记载:“本年正月中,秘命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锐永、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等,前往日本视察,而名称以东莱府暗行御史,故国史只书其复命。其复命也,各有闻见记献上,而烦不可录。”<sup>④</sup>由此可知,这次派遣活动对当时的朝鲜王朝来说是希望能够秘密进行的,之所以要保密的原因主要为了尽可能避免激起国内保守士人的不满情绪。

游览团的行程情况大致如下:1881 年 5 月 7 日从釜山乘坐日本商船安宁丸号出发,次日抵达长崎,14 日抵大阪,17 日抵京都,21 日抵神户,25 日抵达东京。从 5 月 25 日至 8 月 7 日在东京逗留 74 天。其间往横滨、大阪等地考察。8 月 7 日后,除鱼允中、金镛元二人外,其余游览团成员陆续分批回国,于 8 月 25 日返回釜山<sup>⑤</sup>。值得一提的是,从游览团成员的相关记录中可以看到,日方给予游览团一行的接待规格相当之高,“日人朝议以臣等之来谓之修好益笃,预饬沿路勤于接待,且遣外务省属官迎接于中路,所过之地,地方官或来见于店社,或请邀而

① 《日省录》,百七十七,丙子二月初六条。

② 关于“绅士游览团”人员构成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 年,第 114—117 页。

③ 东莱府即今韩国南部釜山地区,暗行御史是朝鲜王朝时期直接受国王任命前往地方巡察的官员名称,类似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钦差大臣。

④ 见《高宗实录》卷 18,高宗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条。

⑤ 游览团行程情况具体可参见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 年,第 122—126 页。在滞留东京的二人中,鱼允中于当年年末始归国复命,而金镛元此后行踪未见记载,去向不明,参见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 年,第 125、119 页。

馈之”<sup>①</sup>。

朝鲜政府给 12 名朝士布置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考察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加记录,并要求其在回国后提交相关的报告。而每一位朝士的考察对象,都是各有侧重的。从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来看,大致可以确定如下成员任务分工情况:朴定阳的考察对象为日本内务省和农商务省、闵种默为外务省、鱼允中为大藏省、赵准永为文部省、严世永为司法省、姜文馨为工部省、洪英植为陆军情况、李锐永为税关情况<sup>②</sup>。除了提交各自负责部分的专门考察报告之外,有几位成员还撰写了以《闻见事件》为题的报告,此外,有一些随行人员也留下了若干单独成册的游记文献<sup>③</sup>,这些内容更侧重于日常见闻的记载,而其中呈现了大量有关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情况。

就“绅士游览团”的影响而言,它的派遣最初虽然只是以刺探情报为目的,但游览团成员归国后提交的大量考察报告及其后续影响远远超出了预想。一方面,这些有关日本现代化改革的情报,对朝鲜政府原本就持开化观点的士人群体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而对于保守士人群体也或多或少产生了不小的刺激。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的影响并没有很快显现出来,但从长远来看,游览团带回来的日本经验,最后还是通过一种渐进的形式,深刻影响到了韩国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在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层面。

## 2. 领选使

比之向日本派遣“绅士游览团”一事,朝鲜政府向中国派遣“领选使”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和直接,那就是派员到中国学习军械制造技术,同时购置必要的机器设备,争取尽快在自己国内设立军械制造工厂。在经过一段时间和清政府的沟通之后,清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于是 1881 年 11 月 17 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朝鲜政

① 见赵准永:《闻见事件》,藏奎章阁,藏书号:奎 1311-1,第 1—2 页。

② 以上情况主要由游览团成员归国后提交的报告推定,如朴定阳:《日本内务省及农商务省视察书启》(奎章阁藏,藏书号:奎 2577)、朴定阳:《日本内务省视察记》(奎 2576,2449)、朴定阳:《日本农商务省视察记》(奎 1150,2450)、闵种默:《日本外务省视察记》(奎 3712,3015,3711)、闵种默:《日本各国条件》(奎 1835)、鱼允中:《日本大藏省视察记》(奎 6266)、赵准永:《日本文部省视察记》(奎 2871,7765)、严世永:《日本司法省视察记》(奎 3703)、姜文馨:《日本工部省视察记》(奎 1834)、洪英植:《日本陆军总制》(奎 3271)、洪英植:《日本陆军操典》(奎 3710,3702)、李锐永:《日本税关视察记》(奎 2451)。另外四人金镛元、沈相学、赵秉稷、李元会相关报告书材料未见。但郑玉子教授据其他材料推测,赵秉稷考察对象为税关情况、李元会为军事情况,参见郑玉子:《绅士游览团考》,《历史学报》(韩国)第二十七辑,1965 年,第 119 页。

③ 此类文献包括如:赵准永:《闻见事件》(奎 1311-1)、闵种默:《闻见事件》(奎 1311-2)、李锐永:《闻见事件》(奎 1311-3)、严世永:《闻见事件》(奎 1311-4)、姜文馨:《闻见事件》(奎 15250)、李锐永:《东游录》(古 6370-2)、随员姜晋馨:《日东录》(奎 7774)、随员宋宪斌:《东京日记》(古 4710-4)。

府以官员金允植<sup>①</sup>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sup>②</sup>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1882年1月25日（农历一八八一年腊月六日）抵达天津，其后，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及至1882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批成员回到朝鲜，这次学习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关于“领选使”派遣的情况，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史料，主要是身为“领选使”的金允植的相关记述材料<sup>③</sup>。

朝鲜学徒工匠进入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金允植对他们各学习何种技艺作了详细的记载，而通过东、南两局总办定期回馈给金允植的《朝鲜学徒勤慢草》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从金允植自己的掌握，以及两局的汇报，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参差不齐，有的进展顺利、学有所成，也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而在天津期间，金允植几乎一有空就往机器局跑，一方面是了解并监督匠徒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机器局中各厂进行实地考察。从金允植留下的记录看，他对机器局各厂的生产物件、核心技术、制造程序、产能产量、资金消耗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sup>④</sup>。而从金允植的大量记述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大量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情况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发展的场景。

关于“领选使”派遣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一次领选使行的使命中，所谓的军械学造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如金允植自己所说的：“（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

① 金允植（1835—1922），字润卿，号云养，出生于清风金氏两班望族世家，八岁时父母双亡，其后随叔父一家生活，十六岁前往汉城求学，先后师事朝鲜大儒俞莘焕及朝鲜开化思想鼻祖朴珪寿，较早形成了救国图强的开化思想。他于1865年以恩荫出任健寝郎，1874年文科及第，其后历任顺天府使、江华留守等职。1881年，他以吏曹参议衔任“领选使”出使天津，在带领学徒工匠学习的同时，考察清朝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其间还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有接触。1882年朝鲜“壬午军变”中，他请求清朝派兵平乱，事后协助高宗巩固其政治权力，成为亲清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朝鲜先后参与创立机器局、现代海关，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参见金允植：《金允植全集》（全二册）第一册，解题，收入韩国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韩国近代思想丛书》，（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初版、2005年再版，第v—x页。另可参见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来往天津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1—2页。

② 据文献记载，该使团有姓名可考的成员人数为69人。金允植：《领选日记》中有使团成员名单，同时，金允植还提到：“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见金允植：《领选日记》，收入〔韩〕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全三册）中册，〔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20—423页。可见，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69人。

③ 这些材料包括：前引金允植：《领选日记》，《领选日记》亦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册；金允植：《天津谈草》，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93册；金允植：《阴晴史》，《韩国史料丛书》第六，国史编纂委员会1958年版。

④ 参见拙著：《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谈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复旦学报》2010年第2期，第30页。

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sup>①</sup>而这里所说的“议约事”，指的是当时美国要求和朝鲜缔结通商条约一事，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1882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六），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不少学者认为朝美议约的部分更为重要，而我则倾向于认为军械学造和联美议约是这一次“领选使”派遣活动两个同等重要的面向<sup>②</sup>。

关于这一次“领选使”派遣活动的评价，有韩国学者认为它的结果是失败的，因为其间朝鲜国内爆发的壬午军乱使得这次活动以半途中断收场，但我认为完全以失败论之太过于绝对化。1883年6月，朝鲜历史上第一家机器局在汉城三清洞北仓正式开设，金允植顺理成章地成为该机器局总办之一。而为了机器局的顺利运作，朝鲜政府特地从清朝聘请来四名工匠，于局内教习制造之法。尽管在金允植的记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选派到天津的学徒工匠最后去向的明确记载，但从朝鲜北仓机器局在短时间内就得以组建完成这一点大致可以推断，一部分前往中国的工匠学徒很有可能成为了该局初创时的组成力量。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北仓机器局这样一个事件，和此前“领选使”的选派不能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领选使”对于韩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大致可以从这一点上得到体现。

## 二、朝鲜观察者眼中的中日现代化场景

### 1. “绅士游览团”所见之日本现代化场景

由于“绅士游览团”肩负着“详探彼中物情”的任务，所以其成员对当时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情况无不考察入微，他们留下回国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以及见闻记录，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府设置、国民经济、工业生产乃至日常生活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载，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完整呈现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现代化改革之后的面貌，而本文只能择取几个面向的问题加以讨论。

#### （1）政府设置

关于日本政体和政府设置的情况，主要可以通过游览团成员的各类《视察记》

① 见前引《天津谈草》，第210—211页。

② 关于“领选使”派遣中有关朝美议约问题的论述，亦可参见《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谈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一文。

材料得到反映。前文已经提到,此类《视察记》涉及的内容涵盖了日本内务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司法省、工部省、陆军省以及税关(海关)等几乎所有政府设置情况,而每一种视察记的记载都极为详尽,其篇幅少则七八十页,多则数百页。以闵种默的《日本外务省视察记》为例,其篇幅就达到八卷四册之多,现将其目录摘抄如下:

### 外务省

#### (一) 沿革和职制

#### (二) 职掌事务

#### (三) 各局事务章程

#### 公信局、取调局、记录局、庶务局、会计局

#### (四) 交聘 通商

各规则、公文书式、商税论例、各国条约、居留条约、贸易则类(海关

关税则、贸易章程、通商章程)、六港开港、税关规例、各国税则<sup>①</sup>

事实上,几乎每一种《视察记》都是按照类似的一种体例编排撰写的<sup>②</sup>,而这些《视察记》的写成,一定不是某一位游览团成员仅通过眼见之情就能够完成的,而应当是直接参考了当时日本有关本国机构设置的文献,因此其反映的都是相对客观的情况,而较少有主观评价性的内容。不仅如此,这部分《视察记》材料所达到的详尽程度,使其具有某种操作上的可模仿性,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在之后韩国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资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亦在情理之中。当然,关于日本政府设置的实际情况,从游览团成员的另外一类《闻见事件》材料中也有所反映,此处不再具体展开。

### (2) 社会见闻

相对于《视察记》材料而言,游览团成员留下的《闻见事件》类材料以及一些游记类材料,可以说是对当时日本社会各方面情况的一种更加直接和鲜活的记录,不仅读来更有趣味,其中反映的日本社会的情况也更加具体和细致。这些记录对关注 19 世纪末日本的研究者当都有一定的价值。而在里,主要将选取一些体现现代化变革对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材料加以介绍。总的来说,游览团的成员在日本看到了很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新鲜的事物,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现代化的产物。试举几例:

第一,铁路。

① 闵种默:《日本外务省视察记》,奎 3712,3015,3711。

② 具体可参考郑玉子教授在《绅士游览团考》一文中对所有视察记材料目录进行的摘录,见《历史学报》第二十七辑,第 136—139 页。

闵种默的记载：

铁道始于明治二年，自东京至横滨七十里余，自神户至大坂九十里余，自大坂至京都百二十里余，自京都至大津，大津至越前敦贺接续落成，将延全国云。已筑之程仅三百里余，筑道费千百万圆余。<sup>①</sup>

赵准永的记载：

火车铁路为其行旅货物之载输者也，凿山谷架川壑自东京至横滨自神户至大坂西京大津及越前敦贺共为三百余里。以铁条列路，轮行其上，带车数三十辆，前车启行，后车衔尾随之，一时顷行百余里。每数十里置一局以为行人相递之所。<sup>②</sup>

关于日本铁路情况的更为详尽的记录，见于姜文馨的随员姜晋馨所撰写的游记文献《日东录》中：

先于东京横滨之间自庚午三月始役至壬申九月竣工，计程里七十三里余。而大抵先治其道，遇山则凿，逢水则桥。其直如矢，小无屈曲。其平如砥，亦无高低。乃以铁杠间四五步横埋路上，次以铁线之体可载车轮者四条联络亘布于铁杠上，盖铁线中则坎而上下阔，轮铁内有郭而外边平，轮郭□于铁线转动，小无差跌。设置四条者，二条曰本线，二条曰副线，各有来车往车之殊，使不相撞破。又有支线使车轮转环之所。而车制则一架假如二间屋子，而两傍布板稍高可以踞坐，四面穿窗开合可以纳凉。一架可容数十人，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别。分等收税，高下悬殊。火轮则但设前车，次以螺线连车，一车纵一车至于数十辆之多。一火轮一时刻达于百余里之地，疾如电掣，人不甚摇。每二十里设一馆，置官人检查行旅收税。而乘车者给标，下车者捧标，标皆有上白中青下红三等之别，考此捧价，毫无紊乱。……行止必有报号，停止用赤色旗，疾行用白色旗，徐行用绿色旗，夜行以灯色为证。所载虽包裹之小禽兽之物，具有计程定税，三十斤以下五里四钱，十里八钱，六十斤以下五里八钱，十里十五钱，携禽兽则五里五厘十里一钱，至于百里以此为准。<sup>③</sup>

而在另外一个游记材料——李元会的随员宋宪斌的《东京日记》中，记录自己亲身乘坐火车从京都到琵琶湖的经历，其中还专门提到了铁路隧道的情况：

西京琵湖之间有大谷地，凿山穴通铁路者为五里。而穴作虹霓形，

① 见闵种默：《闻见事件》，奎 1311-2，第 8 页。

② 见赵准永：《闻见事件》，奎 1311-1，第 6 页。

③ 见姜晋馨：《日东录》，奎 7774，第 39—40 页。

具以紫壁隔灰筑之，殆非人力所及，其富强可知也。<sup>①</sup>

## 第二，邮局。

关于日本邮局的设置，闵种默有如下记载：

邮便局始于明治四年设行至十二年，内国都府市邑及联盟各国文书物品往复递送之件，随其量之轻重地之远近定其货税，规式甚多，而大概局所三千九百所。<sup>②</sup>

而姜文馨亦有如下记载，其中更是提到了邮筒、邮卒、邮票以及邮资等颇为细节的内容：

设驿递局，置官吏邮卒以便公私通报，其法于每町通衢竖邮便筒，或以铜铸或以石造，而欲付书信者无论远近，特书所去地名付钱标置之邮筒，则邮卒辈时时搜出，随其地方分置其次邮筒，其次所在邮卒亦搜出传次，以此为准。一日之内达于百里。至于外国绝域无所不通。……自官先造钱标，自几圆至几钱，捧钱卖标，则付书者称其书封轻重而买标付之书封。重为一钱则付十钱标，重为二钱则付二十钱标，重为三钱以上价为倍之。一年卖标金与地税比等云。<sup>③</sup>

## 第三，电报。

关于电信局即电报局的设立，赵准永有如下记载：

东京置中央局，以通四方。而其制以铜为线，架设于旱路，沉联于水中，引而伸之。两头有机，旋转音信以洋书二十四字相报，虽千万里顷刻即达，而逐字多寡亦给其资。择要地设分局，局有八十余所，人欲私设而接官线则政府许之。<sup>④</sup>

姜晋馨《日东录》中对电报的记载亦相当详细：

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水上或沉水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虽万里即达也。电气之万里传信彼此只凭一盘，盘中有针，四围有字，针旋指字，随指随录，为一幅书。如指元亨指利贞以知元亨利贞之类也。此边此针旋时彼边此针亦旋也。<sup>⑤</sup>

除此之外，从闵种默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发送电报的价格：

① 见宋宪斌：《东京日记》，奎章阁，古 4710-4，第 14 页。

② 见闵种默：《闻见事件》，第 8 页。

③ 见姜文馨：《闻见事件》，第 21—22 页。

④ 见赵准永：《闻见事件》，第 5—6 页。

⑤ 见姜晋馨：《日东录》，第 43—44 页。姜晋馨不仅记录了自己看到的电报操作的情况，还详细了解并记录了电报的工作原理以及各国电报建设的简要介绍，写成一篇洋洋数千字的《电信之法》，见《日东录》，第 44—52 页。

自东京最东者小樽局而和文四十八钱横文二圆五十钱，最西者的鹿儿局而和文四十九钱横文二圆五十钱。<sup>①</sup>

#### 第四，医院。

闵种默记载了他在京都时看到的医院的情景：

病院亦在东区内，馆廨宏阔，院有长看事员二十六，生徒三百名。统一年院外院内之来患治病者亦七千余名。治病之具专以银铜为割剥针刺之具。各属为二万余钉，每钉又不知几百千个。罗列床桌，又置治病引伸便用之各种械器，而专试洋制水药，尚延泰西教师隶工焉。<sup>②</sup>

此外，宋宪斌在考察了位于大阪的病院后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当然，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因为对西方医学的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

病院则左右长廊，治病之人无虑数百，而医者亦如是。治病之具多剥割穿通，如有滞症则以长络自口穿下，如大便不通则以小桶纳于肛中。不用汤剂全用丸散。人形之剥皮者□脏腑者见之极骇。病人之死者剖视脏腑以验其受病之处。其业可知其极巧而其用心则诚残忍。此岂仁人之所为哉，可怪可骇也。<sup>③</sup>

#### 第五，飞脚船。

同样在《东京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一种日本用于国内水路客运的大型轮船——飞脚船的记载：

乘东京三菱社飞脚船广岛九号者，船长六十间，广八间，高七八丈，人居之处有三层，上层及中层并居上等之人，而两行作大间架，中作小间架，每一间架仅容一人之卧，而必设毡褥必垂锦帐，当中往往设长桌连豆数十间，桌上铺锦被金银玻璃之属，作茶器酒壶列置被上，上设玻璃□使之通敞。夜则间一间悬玻璃灯照耀明朗。下层则船后作大间架，中小间架之屋者合为四十六人之居，其制作也可谓下等也，向前隔板作一通大房二十五间，可容百余人。其上中下三等云者，虽下等之人若出上中等船费则居上中等，上中等人若出下等船费则居下等。船之中间设火轮器械，船外两边设大铁轮，号为明轮船，内汽机一动则船外明轮随转，船行如飞。<sup>④</sup>

#### 第六，潜水衣。

① 见闵种默：《闻见事件》，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见宋宪斌：《东京日记》，第8—9页。

④ 同上书，第15—16页。

在宋宪斌《东京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一则关于日本人使用潜水衣的有趣记载：

筑埠人之入水底也，头面则以玻璃缸冒之，身则以不濡水之物作衣着之，足则用皮作靴而靴底则以铅为之，使之入水不浮。衣上缀于玻璃缸之下口，衣下缀于革靴之上口。又用一条通气物出于水外。水外人乘船持条随其运动笼络使之通气，则终日水中作役无碍，亦可谓巧矣。<sup>①</sup>

### (3) 国债问题

几乎在每一种闻见事件材料中，都提到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国债的问题，以下摘录几条材料加以说明：

国债，政府之所负公债，而所以补岁入不足者也，其财主若内国人则称内国债，外国人则称外国债，理财之间出于不得已之权道，而自日本封建世已行。然若作之证书以纵买卖则取法于欧米也。现时所负国债合计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圆。以上诸国债将期今后二十六年全偿云。<sup>②</sup>

此处提到的“作之证书以纵买卖”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实行了类似于发行国债券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经济运作模式，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精确到个位数的当时日本的国债数额，这个数字在其他几位游览团成员的记录中没有太大出入<sup>③</sup>，应该是当时日本自己的一个官方统计数据。

日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各类支出费用颇巨，如赵准永所言：“改制以后外交各国差遣、公使公廨之设、器械之备自多靡费。”<sup>④</sup>而据闵种默了解到的日本明治己卯年七月至庚辰六月的国家预算情况，一年的国家收入总计为五千五百六十五万圆余，刨去国债本息偿还和各项开支，仅余下一百五十万圆<sup>⑤</sup>。

对于当时日本的国家经济状况，作为观察者的朝鲜游览团成员各有自己的评价：

(姜文馨)国计以是不足，印刷局造纸币自己已始用，而奸民辈偷隙赝造，真伪混淆，众皆苦之。至于金银钱则皆流入泰西诸国。虽日铸万

① 见宋宪斌：《东京日记》，第15页。

② 见闵种默：《闻见事件》，第5—6页。

③ 赵准永：《闻见事件》记载“内外新旧现在公债至为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圆之多”(奎1311-1,第3页)，李锐永：《闻见事件》记载“自内国至外国而公债之渐积今为三亿六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九百七十余圆”(奎1311-3,第4页)，严世永：《闻见事件》记载“国债积至于三亿万有余”(奎1311-4,第7页)，姜文馨：《闻见事件》记载“内外国债犹为三亿五千八百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圆”(奎15250,第4页)，几无差异。

④ 见赵准永：《闻见事件》，第3页。

⑤ 见闵种默：《闻见事件》，第6页。

钱可谓纸上空文，物价昂贵，民难聊生。<sup>①</sup>

(闵种默)所谓造纸当货者货如非货，而得之者不思储藏，用之者亦似轻易，是故钱路多歧，物价腾踊。且因商物之来市，如干金银之零货尽输于西国人之换归，而莫知如何听于民，则生涯渐益困乏，气象若不安顿，莫不有不如前时之叹也。<sup>②</sup>

(李锐永)国债积至于三亿万有余，于是乎预算三十年之用，则推此一事可知其枵然无实，识者之忧叹多见于言辞者矣。<sup>③</sup>

(赵准永)金银之货皆归外人之手只铜货与纸币流通于国内。<sup>④</sup>

(严世永)自明治三年十一月至十二年发行金货五千二百万圆余、银货二千八百八十三万圆余、铜货四百八十六万圆余，计八千六万百二十一万九千圆新货之发出，如是其多，而太半输出海外以补贸易之不均。其余潜伏于国内官民间，卖卖上殆绝迹焉。今为之用者独有政府所开纸币一亿余万圆与各国银行所出纸币数千万圆。年来纸币大损价格，物价腾贵，万民困苦，虽难遽知其原因，言纸币过发遂至此弊，其说似得当。<sup>⑤</sup>

从上述材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因为偿还外部国债以及贸易逆差等皆以金银结算，使得日本国内金银货币大量外流；二是日本政府以国计不足而大量增发纸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游览团成员几乎都倾向于认为，日本的所谓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国内民众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这里之所以要将国债问题拿来讨论，主要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游览团成员对于日本的国债问题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化进程在带来发展和进步的同时，总还是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一些负面的因素。不管是对于日本还是中国，或许只有同时看到其现代化进程正反两方面的面貌，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所谓的现代化问题。

## 2. 领选使金允植所见之中国现代化场景

和“绅士游览团”成员得以观察到日本社会诸多层面并留下大量文献材料的情况略有不同，领选使金允植为我们留下的有关中国现代化情况的材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金允植留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能够反映中国当时现代化发展的

① 见姜文馨：《闻见事件》，第4页。

② 见李锐永：《闻见事件》，奎1311-3，第4页。

③ 见严世永：《闻见事件》，奎1311-4，第7页。

④ 见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页。

⑤ 见闵种默：《闻见事件》，第7—8页。

内容,主要都集中在工业制造的层面,特别是军工制造活动的场景,尽管如此,这部分内容大致也可以让我们对当时的现代化场景有一定的了解。

应该说,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之后,机器制造业经由军工制造活动的带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洋务运动从政治的层面来讲以失败告终,但是其间建立起来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还是存在的。在朝鲜使者金允植的眼中,1882年的清朝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达到了足以令其惊叹的地步,而作为中国人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似乎并未有哪怕一点点的兴奋,这恐怕又是所谓的后见之明在作祟。不如就让我们试着通过他者的眼睛,重新看看那一些被掩盖的成就。

### 第一,天津机器局。

1882年3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日),金允植第一次参观天津机器制造局,当即被规模宏大的大机器生产的场面所震撼,他在日记中为我们记下了当时的所闻所感:

饭后又与蒹山历观机器、翻砂、木样、画图、电机、火药诸厂。各有汽气大轮,诸小轮随而旋转。下施机括,上架铁筒,连延相贯数三十间。千百机器,皆用一轮之力。有右旋者,有左旋者,有向下穿孔者,有从傍钻穴者,有截铁者,有磨刀者,有砻削木者。有碾铜者、融化铁者、出入冷热水者。如浑盖旋运,日月五星,各循其度。疾舒纵横之不同,殆匪夷所思。最是电气逼夺造化,不可形喻也。<sup>①</sup>

除此之外,通过金允植的记载,还意外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1882年间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技术骨干人员的名单:

东局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顾敦彝、杨春选,洋文教习严宗光、许兆基、曹廉正,洋枪队教习卞长胜。

水雷学堂汉教习邵瑞琮、梅映桂,洋教习郑宇澄。

南局牛星斋昶炳、龚鲁、卿照玙、董芸阁,

东局木工房教习工匠候永顺,

机器房教习工匠童修元、王起、孙起堂,

工头王起顺、鲍义彬、梁阿生、黄润秋,

木工头周长庆,

铜冒房工头赵顺、陈正、蒋得发、赵得成,

火药工头王永来、刘德、潘起、刘长泰,

①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6页。

锯水唐明义。

南局前厂姜瑞永、宋瑞阳、吴灯高，南局后厂吴凤珊，翻砂厂欧阳满。

电气、画图、木样霍良顺，

又有曾左德、潘明谭、文华三人。<sup>①</sup>

天津机器制造局可谓代表当时中国国内现代化技术最高水准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历史，或许这份名单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价值。通过这一份名单，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规模和人力配置的情况。

除了宏大的机器生产场面，金允植在天津期间看到了很多对他来说十分新鲜的器物，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第二，火轮船。

金允植在天津看到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的试造：

由东城而下，见有一只小火轮船，新制，外置河沟。军人方凿沟贮水，将运至天津。李中堂方欲广造轮船，先试此小样也。夜深不得上船，观制造之样。

十六日……仍往昨日所至处登观。轮船长可八间，广可二间有余。

船头设汽气烟筒，船头设铁轮。中间机括相通。具体而微。内设坐，房铺鲜明，四面设琉璃窗，垂以彩幔。壁上多挂钟表。是中堂所坐处云。<sup>②</sup>

## 第三，电报。

金允植看到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架设：

……自此见电线。起于天津，达于上海，四千余里。数十步立一杆，挂铜丝两条，相续于路。行人由其下往来，无敢伤损，可见立规之严也。<sup>③</sup>

## 第四，电话。

金允植还看到了中国第一批电话机的仿造，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看“绅士游览团”对日本的考察资料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有关电话的记载：

至电机局，见语话筒，两头系铜线。侧耳听之，略可辨认。亦外国贸来者。此厂工头周长庆将仿造云。<sup>④</sup>

<sup>①</sup> 朝鲜学徒工匠入学机器局，金允植上下打点，给机器局内骨干人员一一送礼，并将送礼清单录于日记中，是以留下了这样一份名单。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20—521页。

<sup>②</sup>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518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472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564—565页。

第五，劫匪与洋枪。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事件，金允植在津期间曾向清政府报告一起学徒遭劫事件，进而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金允植的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昨早，学徒李礪先由天津机器局起身，随带行李、银物等物，行有五十里之遥，过金钟河，在宁河县所管大封桥里许，北至怀鱼闸十八里，南至山岭庄十五里地方，遇贼四人。年纪约三十多岁、二十多岁不等。并未骑马，各人手执小洋枪。所有银子、衣服，尽被抢去。幸得保命还归。<sup>①</sup>

我们看到，在这起抢劫事件中，出现的四名劫匪，竟然“各人手执小洋枪”，这样一起运用新式武器抢劫的事件，大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中国，洋枪已经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事实上从金允植另外的一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天津机器局军械制造的产量已经很高了，这些劫匪所使用的“小洋枪”，或许就是价格并不昂贵的国产火枪。通过这一件小事，大概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清朝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了。

## 结语

发生在 19 世纪韩国的两个历史事件，为我们呈现出了同一时空下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历史场景。尽管两者所呈现的面向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改革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日本的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改革，最终使其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层面鲜明地体现出来，但是全面急进的发展力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财力的空虚。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现代化变革，具体来说就是先行发展机器制造业和军工产业，同样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并且可以说并不落后于日本，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现代化局限性太大，致使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没有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朝鲜王朝意识到需要开化和武备自强的时候，虽然起步稍晚，但它所面对的机遇其实是空前优越的，在相邻的中日两个国家已经探索了一段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并将一些经验教训通过各种途径传递过来之后，它事实上拥有很好的条件可以综合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取长补短的学习和实践，而朝

<sup>①</sup>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 510—511 页。

鲜事实上也正打算这么做,但是当时的问题是它没有能够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来发展自己,最终内忧外患的大环境阻碍了它顺利向前发展的脚步。我认为如果将以上这些情况联系到一起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幅完整的19世纪末东亚现代化的图景。

“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派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比较中日现代化改革场景的绝好机会,事实上,这样一种机会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和唯一的。随着近年来学者对韩国所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利用,有两大类的资料逐渐浮现,一是朝天录和燕行录资料,即朝鲜使节往来中国的记录,另一类是通信使文献,即朝鲜使节往来日本的记录,而如果将这两部分资料联系到一起,有很大的可能我们可以找到某一时期有关中国和日本两边情况的同时记载。本文所涉及的“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虽然从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燕行使和通信使的范畴,但基本上也是上述史料状况的一种同质性表现。而这样的一种史料状况,在合适的研究者那里,有很大几率可以催生出一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当然,这还不单单只是史料价值的问题,这样的史料状况形成的历史背景,才更是有意思的话题。与其说通过韩国留存的史料可以将中日两国的历史叙述联系到一起,倒不如说韩国在历史上的东亚三国关系中本就扮演着有趣的中间人的角色。笔者认为,不管是出于史料留存状况还是历史角色特殊性的考虑,都不难看到韩国因素在未来的东亚史研究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于东亚史、东洋史等提法,在当下的历史学界,多数学者非但不会感到陌生,而且还往往乐成其拥趸,这实际上是对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理念和方法的认同。西方学界之所以强调亚洲史或者东亚史,或多或少是源自于其学术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对于区域史研究的热衷。而对于东亚这一范畴所直接指向的中国、日本、韩国而言,其学界在接受这一点上更没有太多的观念障碍。在东亚三国学界对于东亚史研究的重视这一点上,即便不能完全排除西方的某些学术主张的强势影响,但归根到底应该看到,其各自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仍是最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比如中国学界向来有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等提法,日本学界虽有“脱亚入欧”一面,但其“大东亚”的学术传统亦始终在基底流淌,韩国学界亦历来有重视东洋史研究的传统。姑且不论目前的实际情况如何,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本就身处东亚的三国学界,从长远来看,在研究自身的问题上定然有着西方学界所不具备的优势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东亚史研究强调的是将东亚这一区域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这里所说的整体,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联系。具体地说,在东亚这一区域范围内,针对某一特定现象或事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域之间能否找到某种关联,继而将其作为整个东亚的问题加以理解和认识,这

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如果所谓的东亚史只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空洞的符号，而各国从各自立场和角度进行不同表述，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东亚史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视角，或者说一种可能性，即以往按照东亚三国的国别史展开的叙述，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纳入到东亚地域的整体框架中重新加以考量，如此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相对宏大的背景之下更好地理解某些问题。

朝。由立都府朝然置是不并聚出的会既快，且夹事，会以政学相累革去  
者渐至拂游的类大两育，用既游既失相不拍拂游为文熟说园转拉香港来举立春  
文妙奇歌是类一民，景丘的国中来游苗剪拂游，拂游景立春味景天博景一，  
算直的太君高，感。将然拂游公瑞两与秋果戚而，景丘的本日来革莫束雅晴明，  
想的近遐说文本，精引相同的只对义助本日味同中关系限却一某候处以正口非谁  
朝该的朝前酥味朝不燕于置不就，1义竟孙“从欲足。”朝表除“味”因故道士转  
经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事实上从金光寺方丈的一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  
教会高，虽然缺史缺一的特奏疏，精表封退同师一的弘朴修史社士是由于本基原  
大深机都用革微而造的广，但向。这些事例里涉及的都是中国僧人和日本僧人  
以及，然当。果先呸湖思深而归源全崇一出生斯以15率八大戒首，里罪音究形即  
所悟有大意，但向。这些事例里涉及的都是中国僧人和日本僧人以及中国僧人和日本僧人  
的思意，其更本，是皆安田内知进路分拂史曲样左，巡回始直俗拂史景只单单不  
不陷，领一降杀知丞遂史臣的国两日中拂归而拂史的官留国转上饭斯其已。墨都  
人青掌，曾航的人间中拂恩育普斯体算本中革美国三亚承的土史讯布因辞折城  
素因革授普敷不，请，忠孝的卦凝卦色负史时景丕亮外存留拂史子出景曾不，大

明治的要重溯来革就宜补心中充哥史亚浓帕来未去  
发生在19世纪韩国的两个历史事件，我们是指出，同时位于中国和日本  
朝庭会不印罪害屡遂，罪学史式由才当五，太尉等史半求，史亚承王汉  
李嗣如秦李行也本望不一氏早亚录徐长蒙王利美云，莫得其始果至生不且而，坐  
理的理同并不一氏早亚录徐长蒙王利美云，莫得其始果至生不且而，坐  
学其于自膳最不更进，史亚承普须臾的亚腊故以祖之界学代西。同人附去代  
改而取得之在元的成效，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日本的会典化中都细朱  
业求五，再耕志成的卷大育好更王原一以变始学表学其，苦而西畔  
的生朱半某治式西相耕全灾脂不劳响，王原一去时量由张长史史亚承王汉  
要重表量是行是计的文朱半某治自暑箕，海智好立御使第昌世器物选表的怕兼  
是界学本目，去势善的汗文察密少图出文字中革来向承华国中皮的。而禁因平生阳  
表依界华国神，拂游的本基立交假不於带朱的革“亚承人”惧自仰面发烟灭亚撒“骨  
痛的痛快梨置御积，吓吸颈背病矣由面目赤不且故。恭善的充耶史羊来野重齐来  
学古而善有承室的梦同始衰弱疑每拂游来近拂游千载奉国主南亚承受使表本表  
起步稍晚，但它所面对的机遇其实是空前绝壁，因此它的大限便以替伏御香俱不暇  
解所表御叫御承代拂游拂游一拂游真物叫度速恭种墨强而趣空革史亚承已事  
郊的御承任根的御承和林基治御神里御御承御御御中象感谢不报承其意，而连  
效承国同不立，卦事效承庚宝卦一某权特，内御革财又一革亚承查，货服奉具。承  
立，承从承承既以随理回的正两个望式卦其卦而卦，郑美特某接供否苗固立，效承

# 2011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历史与经验/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1

(亚洲研究集刊:第六辑)

ISBN 978-7-309-09315-5

I. 亚… II. 复… III. 现代化研究—亚洲—文集 IV. D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0542 号

课题负责人	课题名称
郑怀亮	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快速崛起背景下周边安全挑战及周边外交战略研究
张仲民	历史系 卫生、种族与近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建构
周进	艺术教育中心 朝日时尚文化之流布及其对当代中国青年人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路伟东	历史地理研究所 辛亥以前亚洲腹地的城乡聚落
杨俊霞	中文系 柏拉图《对话录》的亚洲传播

## 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历史与经验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史立丽 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12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15-5/D · 595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